

· 文史杂议 ·

《通典》所收张衡《疏》之作者辨证

谭德兴

(复旦大学 中文系, 上海 200433)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41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0257-0289(2001)03-0138-003

唐代杜佑《通典》收录了张衡的一篇论贡举疏。此《疏》对研究东汉的政治与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其后郑樵《通志》等对此篇张衡《疏》照录不误。今人张震泽《张衡诗文集校注》,张少康、卢永璘《先秦两汉文论选》均据《通典》选收张衡的这一篇《论贡举疏》,并从中探讨张衡的政治与文学思想。但实际上《论贡举疏》的作者并不是张衡,试辨析如下。

据范曄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载,汉灵帝熹平六年七月,蔡邕上封事,其中论及七事,而其第五事之文与《论贡举疏》几乎完全一样,现将二文对照如下(括号内为《论贡举疏》相异字句):

臣闻古者取士,必使诸侯岁贡(古者以贤取士,诸侯岁贡)。孝武之世(代),郡举孝廉,又有贤良文(太)学之选。于是名臣辈(皆)出,文武并兴。汉之得人,数路而已。夫书画辞赋,才之小者,匡国理政,未有其能。陛下即位之初,先涉(访)经术,听政余日,观省篇章,聊以游意(艺)当代博弈,非以教化取士之本。而诸生竞利,作者鼎沸。其高者颇引经(古)训风喻之言;下者连偶(偶)俗语,有类俳优;或窃成文,虚冒名氏。臣每受诏于盛化门,差次录第,其未及者,亦复随辈皆见拜擢。既加之恩,难复收改,但守(收)俸禄,于义已弘(加),不可复使理人及仕(任)州郡。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,章帝集学士于白虎,通经释义,其事优大,文武之道,所宜从之。若乃(乃若)小能小善,虽有可观,孔子以为致远则泥,君子故当志其大者(大者远者也)。

据上,我们可以看出,两文并没有太大差异。其中,“意一艺”、“守一收”可能因音近转写致误。“偶一偈”、“涉一访”、“弘一加”、“仕一任”则可能因字形相近而讹误。“世一代”、“辈出一皆出”、“经训一古训”、“若乃一乃若”的意思基本相同。《论贡举疏》中的“太学”乃“文学”之误,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云“武帝即位,举贤良文学士前后百数。”《公孙弘传》云“武帝初即位,招贤良文学士”、“元光五年,复征贤良文学”,则《论贡举疏》中“太学”应作“文学”。又《论贡举疏》首句中“以贤”乃增衍,与下文“数路”取士前后文义不合。末句“远者”也为增衍,显然不符文义。因此,《通典》所录的张衡《论贡举疏》与范曄《后汉书》所载熹平六年蔡邕上封事文的第五事事实为同一篇文章,二者的细微字句差异,乃文章流传过程中的传抄、转写之误所致,这属中国古代文籍传播中的常见现象。

从思想内容来看,《论贡举疏》不是张衡所作。张衡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,卒于汉顺帝永和四

[收稿日期] 2001-3-18

[作者简介] 谭德兴,(1968—),男,湖南怀化人,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,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论研究。

年。我们将这段时间东汉朝廷的有关选举状况列出如下(据《后汉书》、《东汉会要》):

章帝建初元年,初举孝廉、郎中宽博有谋、任典城者,以补长、相。

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诏“令太傅、三公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郡国守相举贤良、方正、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。”

和帝时,大郡口五十六万举孝廉二人,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。

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诏“令三公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内郡守举贤良、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。”

安帝元初六年,诏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、清白行高者五十人,补令、长、丞、尉。

安帝永初元年三月诏公卿、内外众官、郡国守相,举贤良、方正、有道术之士,明政术、达古今、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。

顺帝即位,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者,一切得举孝廉吏。

顺帝即位,诏公、卿、郡守、国相,举贤良、方正、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。

据上可知,在张衡的生活时期内,朝廷一直把孝廉、贤良、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作为选举对象。而这与《论贡举疏》所要求的是完全一致的。诚然,东汉朝廷的选举有其不实的一面,但,据《后汉书》等史料,章帝、顺帝等最高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,并严惩了一些选举不实的官吏。而且,从章帝到顺帝,东汉的选举制度整体上是比较清明的,没有出现以书画辞赋取士的现象,因此,张衡作为一个有识之臣,决不会向皇帝上这样的疏。又顺帝乃中兴之主,采纳左雄的建议,改革选举制度,力图选举德才兼备的人才,而张衡却对此持不同意见。袁宏《后汉纪》卷十八载张衡对曰:“……自初举孝廉,迄今二百岁矣,皆先孝行,行有余力,始及文法,辛卯诏以能宣章句奏案为限,虽有至孝,犹不应科,此弃本而就末……。”这里,张衡强调以孝为本,以通章句、文案为末,主张选举唯孝是论,不必兼备。这样的选举思想,显然与《论贡举疏》的“通经释义,其事优大”是完全不同的,而章帝辛卯诏所强调的宣章句奏案的选举思想却与《论贡举疏》理想的思想基本一致。《论贡举疏》强调以孝廉、贤良、文学数路取士,并极力倡导“通经释义,其事优大”,坚决反对当时朝廷以书画辞赋取士做法。因此,《论贡举疏》所反映的内容与张衡生活的时代特征不符,当非张衡所作。

三

《论贡举疏》的真正作者是蔡邕。《论贡举疏》反映的是汉灵帝时的政治。汉灵帝即位,朝廷几乎不提孝廉、贤良、文学之选,而以书画辞赋取士成了选举的主要内容,朝廷并为此专门设置鸿都门学,培养这类人才。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云:光和元年,始置鸿都门学生。李贤注曰:“鸿都,门名也,与内置学。时其中诸生,皆敕州、郡、三公举诏,能为尺牍、辞赋及工书鸟篆者,相课试,致千人焉。”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云:“初,(灵)帝好学,自造《皇羲篇》五十章,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,本颇以经学相招,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,皆加引招,遂致数十人。侍中祭酒乐松、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,并待制鸿都门下,喜陈方俗闾里小事,帝甚悦之,待以不次之位。”《后汉纪·灵帝纪》卷二十四云:“初置鸿都门生。本颇以经学相招,后诸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至数千人。或出典州郡,入为尚书、侍中,封赐侯爵。”这正是《论贡举疏》所揭批的社会选举现状。灵帝时,朝廷以书画辞赋取士,并设置鸿都门学,鸿都门学生,不管考试及格或不及格,均给官做。这是对汉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孝廉、贤良、文学等取士的选举制度的彻底排斥。对此,有识之士是不满的。蔡邕在灵帝熹平六年七月上封事,其第五事,即《论贡举疏》就是专门针对此状况而发。蔡邕还在光和元年七月上封事说:“……又尚方工技之作,鸿都篇赋之文,可且消息,以示惟忧……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,开请托之门,违明王之典……。”此可与《论贡举疏》相互发明。与蔡邕同时为官的杨赐对当时的选举现状亦予以批评,《后汉书·杨赐传》载杨赐上疏曰:“……又鸿都门下,招会群小,造作赋说,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,

如骧兜、共工更相荐说，旬月之间，并各拔擢，乐松处常伯，任之居纳言……各受申爵不次之宠，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田亩……。”《后汉书·阳球传》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曰：“……或献赋一篇，或鸟篆盈简，而位升郎中，形图丹青。亦有笔不点牍，辞不辩心，假手请字，妖伪百品，莫不被蒙殊恩……未闻竖子小人，诈作文颂，而可妄窃天官，垂象图素者也……。”杨赐、阳球所揭露的当时选举现状与蔡邕所批评的完全一样。汉灵帝时，废太学，置鸿都门学，放弃以孝廉、贤良、文学等取士制度，而以书画辞赋取士，这是蔡邕等上疏要求恢复汉家孝廉、贤良、文学等数路取士制度，遵从“通经释义”之大道的原因。

总之，我们从汉灵帝时的选举史实可知，《论贡举疏》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的政治内容。它就是熹平六年七月蔡邕上封事的第五事，其真正作者不是张衡，而是蔡邕，它反映的是蔡邕的政治与文学思想。

[责任编辑 张 兵]

(上接 137 页)

成为《水浒》故事的核心人物，而“忠”的结果必是受“招安”乃至主动追求“招安”，这是我们阅读《水浒》时所不能不采取的一种态度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李辰冬. 三国水浒与西游. [M]. 重庆: 大道出版社, 1945.
- [2] 马克思、恩格斯.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(第一卷上 p52)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.
- [3] 聂绀弩. 论水浒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. 水浒研究论集. [M]. 沈阳: 东北人民大学研究部教材出版科, 1955.
- [4] 南京大学中文系. 水浒评论资料. [M].
- [5] 聂绀弩. 水浒是怎样写成的. 水浒研究论集. [M]. 沈阳: 东北人民大学研究部教材出版科, 1955.
- [6] 严敦易. 水浒传的演变. [M].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57.
- [7] 孙楷第.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. 水浒资料汇编.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- [8] 马蹄疾. 水浒资料汇编.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- [9] 邓广铭. 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. 邓广铭治史丛稿. 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10][12] 鲁迅. 中国小说史略. 鲁迅全集.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3.
- [11] 鲁迅. 三闲集. 鲁迅全集.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3.
- [13] 萨孟武. 水浒与中国社会.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98.

[责任编辑 张 兵]